



1945 - 1949

中国共产党 与自由主义力量

曹建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45—1949

中国共产党 与自由主义力量

曹建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45 ~ 1949: 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曹建坤
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388 - 1

I. ①1... II. ①曹...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1945 ~ 1949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3077 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苏莉莉

封面设计 范昊如

1945 ~ 1949: 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

曹建坤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248,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250

ISBN 978 - 7 - 208 - 09388 - 1/D · 1754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导论 / 1

一、何谓“自由主义力量” / 1

二、研究意义 / 5

三、研究现状 / 6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8

第一章 时代背景 / 11

第一节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力量形成的历史 / 11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关系的历史 / 17

第三节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形势 / 23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与民盟、民社党的关系 / 27

第一节 民盟、民社党的主义与立场 / 27

第二节 中共与民盟 / 41

一、合作 / 41

二、说服与被说服 / 52

三、中共对民盟的督促与鞭策 / 66

第三节 中共与民社党 / 84

一、合作 / 85

二、分离 / 86

三、敌对 / 91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与《大公报》、《观察》的关系 / 98

第一节 自由主义者对中共的认识 / 99

第二节 争论的几个回合 / 107

一、何谓自由主义者 / 108

二、挖根与“填土” / 125

三、“新路”不通 / 131

四、“阴谋”与“和平” / 137

第三节 “自由”的窘相 / 146

第四节 审慎地接近与接近中的审慎 / 158

第五节 “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归依 / 183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胡适之间的关系 / 198

第一节 抗战胜利前后的争取与回应 / 198

第二节 胡适回国后的政治态度及中共的抨击 / 202

第三节 胡适的政治思想 / 225

一、文化方面 / 225

二、主义方面 / 232

三、政党方面 / 240

第四节 中共对胡适最后的争取 / 247

第五章 历史的启示 / 252

第一节 经验教训 / 252

一、团结、争取是主导 / 253

二、批评、教育不可少 / 254

三、合理区分很重要 / 255

第二节 历史的错位 / 258

第三节 面向未来 / 264

主要参考文献 / 270

后记 / 275

导 论

本章主要介绍对于自由主义力量这一概念的界定及其分类、这一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状况及研究方法。

一、何谓“自由主义力量”

本书所指的自由主义力量,是指在 1945 年至 1949 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信奉自由主义理论的、除国共以外的相当部分中间力量,他们在政治追求上以英美为模板,推崇西方议会制民主,主张多党并存、和平竞争。他们在信奉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在具体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自由主义力量的组织个体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自由主义者,或自由分子,毛泽东又称之为“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力量主要就是拥护或信奉自由主义理论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至于自由主义力量的具体分类,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是分为一类,如林建华、李伟在《论 20 世纪 40 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征认知及其意义》(《北方论丛》2005 年第 3 期)中,把组成中间势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统统称为“批判型知识分子”。第二种是分为两类,如殷海光就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为“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许纪霖也把他们分为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和行动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沈卫威则把他们分为理性的自由主义(理想式的)和行为上的自由主义(实用式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胡适》,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张育仁不同意把民间自由主义者分为“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他认为他们是集“观念”和“行动”于一体的人。他把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力量分为组党参政型和民间办报型(《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

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三种是分为三类。胡伟希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悖论详述》（《南京社会科学》1991 年第 4 期）中，从视自由为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的角度，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归为三种类型：工具型自由主义者，以严复和丁文江为代表；教条式或理念型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代表；折中型自由主义者，以 40 年代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者为代表。刘荣华、乐晓晖在《裂变中的抉择——对 1946—1949 年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观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增刊）把自由主义者分为民间议政型，以储安平为代表；组党参政型，以张君勱为代表；政府谋谏型，以胡适为代表。章清在《“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一书中虽未明确划出三种类型，但他在指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以刊物为中心聚集民间议政和组织党团的以后，对“胡适派学人群”的研究提出独到见解，认为他们在公开言论之外的幕后活动，即“权势网络”的拓展使得他们不同于上述两类知识分子。他认为胡适、傅斯年走的正是通向权势的曲折之路，他们身份特殊，与进入官僚系统的读书人看不出区别。事实上也就把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分为三类。许纪霖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参政（1945—1949）》（载《许纪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中认为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参政模式有三种：以个人身份进入政府，成为职业官僚；以社会精英的身份留在民间议政；组党介入实际政治运作。第四种是分为四类，胡伟希、林薇在《20 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中，以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态度，把他们分为思想观念型、政治功利型、学术超越型、文化反思型。

本书主张把自由主义力量在组织形态上分为政党（指其中大部分成员信奉自由主义理论）、群体（学人议政群体）和个人三种类型。在当时一百多个政党中，其中影响较大、较有代表性的是民盟、民建、青年党和民社党。民盟、民建左倾，青年党、民社党右倾。所谓群体，是指信奉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以办报办刊、文人议政的形式组成的学人议政群体，他们往往因为拥有出色的报刊质量和广大的读者群，而在中国思想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政治领域掀起一股不小的声势，以

《观察》集团、《世纪评论》、《大公报》同人、北平社会经济研究会及《独立时论》社等为代表。所谓个人，则以胡适为代表。因为他不但是当时知识分子公认的自由主义领袖，而且以他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如傅斯年、王世杰等人，和上述两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在巨大的差别，主要表现是在政治倾向上完全倒向国民党一方。所以，本选题主要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民盟、民社党，《观察》集团、《大公报》同人，胡适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要想彻底搞清自由主义力量与中共的关系，只有逐一研究每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言行，但这是不可能的。把自由主义力量分为这样三种类型，基本可以反映其总体状况，便于说清楚中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里需要对“力量”这一用词做一说明。用“力量”称呼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有点高估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之所以把他们划入同一范围，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和日常言行大致遵循着自由主义理论的规范。至于他们在 1945 年至 1949 年这一时期的具体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则大相径庭。有时不但不能一致，甚至处于对立的境地。这既与当时中国国内及世界上的政治现实有关，又与自由主义这一理念本身有关。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拥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在某些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所以，本书把他们归入同一力量范围，并冠之于“力量”的名称。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中国自由主义者参与政治的方式是有所变化的。在 1947 年底民盟被解散之前，自由主义者主要是以组党的形式直接介入国内政治运作，民盟、民社党、青年党等一些中间性党派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新生力量。但在民盟被解散，青年、民社两党在政治上倒向国民党以后，中间力量居中调解的作用已很难发挥，其“平衡砝码”的中间价值已逐渐丧失。代之而起的则是一些学人议政群体，他们从 1947 年底、1948 年初开始公开树起“自由主义”的大旗，通过鼓吹新的“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对自由主义这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再次做出了标示。

至于在自由主义力量这一范围内，政党、群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

系如何，不管从组成人员还是从政治主张的角度，都是既有重合，也有分歧。民盟的重要成员如梁漱溟、张东荪、费孝通等，都是《观察》周刊的热心作者。但《观察》的主编储安平并未加入民盟，《观察》也不是民盟的独家论坛。由于这些自由主义者大都是有学识、有操守的知识分子，鲜见他们个人之间相互评论的文字。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更多地从他们对于当时具体人事的态度入手。但是，开诚布公地坦陈自己对他人看法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没有。其中，以储安平为代表。储安平在他著名的评论《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就公开了他对民盟的看法。他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来概括民盟，认为民盟是一个“勉强集合起来”的“貌合神离”的政团。他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归为“过去的人物”，认为张君勱“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认为张东荪“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认为罗隆基是民盟领导人物中最“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认为，“民盟诸君子，可以共患难，不一定能共富贵”。^①成舍我同样对民盟有所指责，认为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实际上是“冒中间派之名而不走中间路的先生”^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储安平则把胡适奉为学界领袖和自己的精神导师。储安平比胡适年轻 18 岁，他们属于两代人。从以“后学”自居的储安平写给胡适的信中，我们可以读出储安平的尊重与景仰。在民盟内部，随着民社党的退出及向国民党的靠拢，民盟与民社党已渐成水火之势。自不消说胡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与民盟的区别，就是对于像《观察》这样的刊物，胡适的态度也是值得玩味的。他虽然名列《观察》的撰稿人名单，但在 1947 年至 1948 年整整两年中没给《观察》写一篇文章。从对于一些事件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第 2 卷第 2 期，1947 年 3 月 8 日。

②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34 页。

出胡适和储安平的区别。这大概也昭示了以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群体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类自由主义者是不同的。

二、研究意义

自由主义力量属于中间势力。研究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胡绳非常重视和强调的。胡绳所指的“中间势力”是广义的，包括国共以外的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等。他指出：“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①他认为：“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②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自由主义力量。

自由主义力量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③，“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④。徐宗勉也认为评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以是否赞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否赞成革命划线。^⑤即从理论上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自由主义力量不应当是敌对的关系，他们的任务和使命在反帝、反封建这两大问题上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性。这是中共之所以能够把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拉过来，而大部分自由主义力量也愿意跟随中共的一个根本原因。胡绳认为：“‘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和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间势力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批评、有联合的关系。”^⑥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间势力”主要就

①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②③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④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

⑤ 徐宗勉：《关于评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点想法》，《学术界》2003 年第 2 期。

⑥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 页。

是自由主义力量，他们是中间势力的代表，也是中间势力^①的主流。“有批评、有联合”可以说是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的关系的基调，它贯穿于1945年至1949年整个时期，也体现于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自由主义思潮蓬勃兴起，出现学者组党、参政的热潮。但短短三年后，自由主义力量就不得不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国共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但自由主义力量是中共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的关系是中共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本书力图客观地再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之间曲折复杂的政治关系。这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的的一个方面。这对于厘清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史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自由主义力量的团结、争取和斗争，是中共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争取中间力量的突出例证，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研究和借鉴。学术界对近代自由主义力量的组成和活动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对于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的并不多。本书将着力在这方面有所填补。

自由主义仍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增强执政能力、深化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问题。这一选题可以为一些现实问题寻找到历史上的线索，自由主义的合理因素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和帮助。

三、研究现状

系统研究1945年至1949年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关系的专著还没有，但分别研究中共与自由主义政党、学人议政群体和个人的成果却大量存在。

综合有关民盟的现有研究论著，重点是论述民盟政治活动的各个阶段及其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主要写了中共与民盟之间的团结、争

^① 这个中间势力并不包括农民阶级，是通常所说的狭义的中间势力。

取、合作的历史。而对中共内部的方针政策的提出、制定、变化的过程论述不多。讲中共与民盟等政党的关系史,既要讲清楚民盟思想行为的变化,更应搞清楚中共思想脉络的发展。对民社党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批判和斗争,而对其与中共合作的一面鲜有涉及。

从现有研究《观察》和《大公报》的论著中,可以发现学人议政群体对中国共产党既有正面评价,也有负面评价。同时,学人议政群体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也有激烈的争论。自由主义者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获得的地位,对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策、能力和忠诚、军风军纪等评价较高,并认为,自由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摧毁封建社会这一任务上并非格格不入。中国共产党吸引人的地方,一是它的社会主义纲领,其次是刻苦精神。自由主义者与中共的分歧核心是民主问题,他们不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主要有土改、战争的责任、中间路线等问题。储安平和王芸生二人的最后选择可以代表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中共的态度,是双方关系在这一时期的一种结局。

从有关胡适研究的成果中可以归纳出中国共产党与胡适的关系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抗日战争后初期中共对胡适的争取及胡适的回应,胡适回国后的政治言行及中共的反应,胡适对“苏俄模式”、社会主义及自由主义的认识,以及中共对胡适的最后争取等。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的关系决不仅仅限于上述三个方面。事实上,一些学者正从研究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个人入手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的关系。这些自由主义者除胡适外,还包括梁漱溟、张东荪、施复亮、黄炎培、罗隆基、萧乾、傅斯年等。这些人的身份往往存在交叉现象,因为民盟等中间党派的成员有一部分也是学人议政群体的成员。如张东荪、梁漱溟、施复亮等人,在某些时候侧重于代表民盟,在某些时候则侧重于代表学人议政群体。关于这些自由主义者个人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归入上述三种不同的类型之中。如朱宗震的《驳正一顶黑帽子——黄炎培不是江南地主总代表》(《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4期),实际上说明的是民盟和中共在土改方面的分歧及双方的沟通与协商。左玉河的《张东荪与中

共扑朔迷离的关系》(《党史博览》2001年第5期)则主要揭示了自由主义者在解放战争后期与中共的合作及双方在开国外交理念方面的冲突。

综观近年来学术界关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已经能够从整体上把握自由主义力量的基本状况,包括主要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大致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等。对他们的评价日益客观、公正,并且呈现出争鸣的态势。学者们开始着重从价值理念、思想信仰方面探讨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言行,不再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来划线,肯定了他们的学术贡献及其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就是能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自由主义力量的总方针就是又联合又斗争。并且具体研究了一些人物和事例,开始逐步揭示双方关系的复杂性。

但是,这些研究对于完整揭示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还是远远不够的。双方的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时局发展太快,双方的思想认识与方针政策都在不断地变化调整中。自由主义势力内部在对待同一问题上往往存在不同的观点。他们的共性和分歧到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自由主义力量与国共相比,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在4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变化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在解放前夕,面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他们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研究自由主义力量必须回答的问题。再如,虽然中国共产党对于自由主义力量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认识和态度?现有的论著大多主要研究自由主义本身的思想言论,偶尔也提到中共的反应,但大都没有详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言论和方针政策。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自由主义分子大都学贯中西,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是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本书不是着重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而是研究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研究中共与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团结、斗争和争取过程。事实上,中共对他们的争

取没有像争取农民和工人那样彻底。他们大多留在大陆、拥护中共,与当时飞速发展的时局有相当大的关系,并不见得在思想认识上彻底和中共一致。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造知识分子、1957年“反右”的一个重要伏笔。

在研究思路方面,首先是弄清楚自由主义者在1945年至1949年间的政治主张。这里既涉及中共对他们的认识,也涉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认识。接下来,按照他们的组成结构,把他们分成政党、学人议政群体、个人三种类型,逐一探讨中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回顾这一段历史,总结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特点,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政治现实中的错位窘境,以及对自由主义合理成分的吸收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考察中共与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根据当时出版的原始文献,研究双方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和事实的态度上的差异、认识上的异同。好多情况下,双方都是自说自话。但中共对他们团结争取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可以说是自始至终的。当然,中间也有变化。

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按照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解释书中的诸多政治观点和行为。其次是利用原始文献进行比较研究。进而“由比较而得其异同,由异同而求其会通之道,于是历史不再是以往的陈迹,而富有新鲜的意义”^①。同时,力求理论与史实相结合。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历史活动的事实。再者,依靠个案说明问题。文章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以典型人物、组织和事例为代表,用个体的观点和行为来说明群体的情况。

这里尤其要说明笔者对“精英历史”和“大众历史”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学者指出,西方关于新历史与旧历史的争论,形成了精英史(elitist history)与大众史(populist history)的分野。所谓精英史即帝王、将相、贵族和精英分子的事业和成就。而大众史则指的是居在下层的被忽视的乡村和城市的普通大众的历史。^②笔者认为,所谓“精英历

①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②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页。

史”，就是根据社会上的精英所遗留的器物资料而形成的主要由他们参与或重点渗透他们思想的历史。“大众历史”则主要是由大多数普通民众参与形成的已经消失的群体实践。“精英历史”根据遗留的资料大部分可以让后人了解，即它是可以大部分恢复的，而“大众历史”由于资料的缺乏，大部分是不可以恢复的。也有的学者把思想史中的“思想”分为“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并认为：“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超出常识，它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为支持着常人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知识与思想，常常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写的最经典的著作。”“思想与学术，有时候只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是悬浮在社会与生活的上面的。”^①以此来看待中国的自由主义力量，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思想是“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他们的历史是“精英历史”。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自由主义力量所形成的历史与普通民众所形成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普通民众的思想很显然就是“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但它们“并没有留下任何著述，也没有独立的思想”^②。古人云：“雁有遗踪之心，水无留影之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雁”，他们不但有遗踪之心，而且有遗踪的能力和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到他们的论著心得。而普通民众就是“水”，他们不但没有留影之意，即使想留，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所以，我们现在不可能看到解放战争期间哪个农民留传下来的日记或著作。

本书在把握和评价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的关系的时候，是有意识地把自由主义力量放到“大众历史”的视角和范围内去考量，目的是使得写出来的历史不至于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

①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3 页。

②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 页。

第一章

时代背景

1945年至1949年间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错综复杂的关系既与当时国内国外风云变幻的政治格局有极大关系,也有其由来已久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力量形成的历史

关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力量形成的发端,学术界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产生和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代表人物为严复、谭嗣同和梁启超。如胡伟希认为严复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①,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②。他把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戊戌维新时期。主要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并开始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的阶段,以严复、谭嗣同为代表;并认为严复、谭嗣同代表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两个不同的传统。严复体现了对英国式立宪政治的向往和对于思想自由的信仰,更接近于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传统。而谭嗣同则强调人体人格的

^① 胡伟希等:《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② 胡伟希:《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塑造，他的关于自由的观点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问题上，较接近于以卢梭为代表的大陆理性主义传统。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走向高涨，突出表现为提倡个性解放的伦理道德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以胡适、前期陈独秀、周作人、蔡元培等为代表；同时，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影响中国的教育领域。以“兼容并蓄”为办学方针的北大，培养出傅斯年、罗家伦等日后活跃于政坛的自由主义者。三是20世纪2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关注的重点开始从伦理道德领域向政治领域转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办报办刊和制造舆论来影响中国政治。以“平社”、“新月派”、“独立评论”派等为代表。四是40年代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提出“第三条道路”，力图超越国内国共两党和国际上美苏的对立。以胡适、周绶章、施复亮、杨人梗、张东荪、张君勱、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及民盟诸君为代表。^①赞成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发端于戊戌维新时期的学者还有刘军宁^②、王彬彬、俞祖华^③等。

以许纪霖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维新时期严复、梁启超等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介绍只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严格而言发端于‘五四’时期。”^④“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⑤

许纪霖认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划分，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思潮组成。”^⑥中国的自由主义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不但是舶来品，而且是“修正”型

① 胡伟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悖论详述》，《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学术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http://www.zgrj.cn/pages/p9_024.htm。

③ 俞祖华、赵慧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综述》，《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④ 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发展史》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27页。

⑤ 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

⑥ 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开放时代》2000年第1期。